

日本经济安全战略选择的历史与现实

高晓雁

(南开大学 马列教育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日本由于国土狭小和资源匮乏,为实现民族扩张,大国追随战略一直是日本皇族与政府的首选国策。从明治维新的“脱亚入欧”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脱亚入美”,在依附西方大国和被其扶植下,日本经济获得高速发展。与此同时,在追随西方列强过程中,日本做了许多伤害亚洲人民利益和感情的事。但当日本经济可以和美国分庭抗礼时,美国便从扶植和支持转向责难和限制。面对自己复杂的历史,选择怎样的安全战略是现代日本经济安全的关键。

关键词:日本经济安全战略;脱亚入欧战略;脱亚入美战略;东亚经济合作

中图分类号:F114.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6)06-0110-03

国家安全与发展问题是世界各国政府决策的主题,日本政府也将经济安全确立为日本安全保障体系的核心,并看成最终“解决‘经济大国’与‘政治小国’、‘军事弱国’这一矛盾的基础”[1](P22)。但是,日本经济安全政策的基础仍是日美安保体制,与亚洲地区安全合作只是这一体制下的补充。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形势和安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当日本经济可以和美国分庭抗礼时,美国便从扶植和支持转向责难和限制。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后,加强与亚洲各国的合作实际上已经成为日本经济安全战略调整的关键。但是,由于历史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原因,日本政府仍然不能正视现实,做出正确选择。

一

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同时这一地区也面临着从未有过的风险,无论从地缘经济还是地缘政治的角度讲,日本主动改善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已经成为决定日本经济安全的关键。但是,近几年日本政府继续伤害亚洲人民的态度和外交政策令世人不解,回顾日本政府在近现代史期间的安全战略选择的历史与现实将有助于世人的判断。

第一,“脱亚入欧”战略阶段。明治维新后,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鉴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命运,为日本设计了“脱亚入欧”战略,把学习和借鉴西方文明作为实现日本经济强大的唯一途径。随着日本脱亚入欧以及富国强兵双战略的推行,日本逐步走上对外侵略和扩张的道路,特别是在亚洲,伙同西方殖民者疯狂掠夺亚洲资源和抢占殖民地。20世纪初,日本已经

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为日本在亚洲利益的膨胀和实施战争霸权提供了可能。而后,日本在亚洲公然抢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伤害了西方列强在亚洲的既得利益,使西方列强感到日本的威胁,从此,加强了对日本军事和经济的限制和防范。

第二,“脱亚入美”战略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初期的占领政策彻底摧毁了日本军事和经济实力,随着美苏冷战局面的形成,美国把日本当作亚洲桥头堡,对日本的占领政策由摧毁转向扶植和支持。日本政府再次远离亚洲,制定“脱亚入美”的追随政策,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战略,使日本经济又一次获得高速增长。当日本经济与美国经济形成竞争威胁时,美国对日本的摩擦与限制日益加剧,而处于军事、政治和资源劣势的日本在美国和欧洲市场步履艰难,大批日资企业回缩日本本土。但是,日本政府仍然在亚洲缺乏反省,自诩为亚洲的优秀民族,长期推卸战争责任,故意掩盖或淡化战争带给亚洲人民的灾难,特别是日本右翼对其战争行为的宣扬和美化引起亚洲人民的强烈反感。

第三,“亚洲雁行”战略阶段。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雁行模式,他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主张在亚洲开展有利于日本的国际分工与产业转移。80年代初,日本在东亚实施雁行战略,率先将国内成熟产业转移到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地区,而后又将此类成熟产业转移到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与中国。在亚洲东部地区形成一群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亚洲雁行战略实施使日本和亚洲成为一个经济紧密相关、产业层次分明的命运共同体,

亚洲的经济环境对日本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发展契机,与此同时,日本也就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领头羊。

随着日美贸易和投资摩擦的激化,特别是美国为控制日益膨胀的美日贸易逆差,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中迫使日元升值,加剧了日本对美国出口的难度。日美摩擦升级迫使日本开始将经济发展重心转向亚洲。主要通过三个阶段完成。

第一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为消除美日贸易和投资发展的不平衡,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表现出两个明显特征:一是零部件企业投资的增加;二是直接投资动机的变化。过去日本对“四小龙”或其他国家直接投资动机主要是占领当地市场,而现在最大的投资动机是建立日本在亚洲的生产基地、增加向第三国的出口,同时增加对日商品返销。日本在与亚洲经济合作中完成了由重化工业向高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结构调整与升级。

第二阶段 20世纪90年代,日本亚洲贸易的明显特征是零部件及原料等中间产品的贸易远远超过制成品的贸易额。“1990—1998年间,东亚区域内制成品的贸易额增加92%,而中间产品的贸易额增加179%。IT产业零部件出口占有对东亚出口比重由26%提高到56%。”[2] (P64)这说明日本和亚洲的合作关系日益加强,亚洲国家不是日本的包袱,而是日本重要的战略贸易伙伴,如果没有亚洲国家和人民的帮托,日本只能是一只处在风暴中的孤雁。

第三阶段,日本对亚洲的贸易依存度日益提高。特别是日本对中国的进出口急剧增长。据中国海关的统计,2003年中日贸易总额比2002年增加31.1%,达到1335.8亿美元,首次超过了对美出口的数额。中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日本最大的进口贸易国,现在又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贸易国。但小泉政府的右转态度使2005年中日贸易增幅从2004年25.7%和2004年的29%,大幅缩小到9.9%。“政冷经冷初见端倪”[3] (P58)。

实际上亚洲市场已经成为日本经济安全保证的基础。但是,日本政府对历史的不反省态度以及追随西方大国和排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亚洲国家的意识,使它与亚洲人民之间仍然存在隔阂,它将成为直接威胁日本经济安全的最大障碍。

二

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历了十几年的经济萧条,2005年GDP才出现2.6%的增长,而在此期间,国际上则出现发展中国家经济迅速崛起和发达国家纷纷争夺亚洲市场的新局面,如果日本政府不及时调整其安全战略,将对日本经济安全形成巨大威胁。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结构性的失调和泡沫经济的崩溃,使日本经济进入持续的萧条期。虽然1996年度经济出现短暂恢复,但消费税的提高和东南亚金融危机使日本经济在1998年再度出现负增长。

万方数据

为保证1999年的经济正增长,日本政府以巨额财政赤字为代价实现了2000年的1.5%增长。进入2001年,日本经济状况又趋恶化,不仅经济增长率降低,且同年3月份政府首次认定日本经济处于通货紧缩。日本经济持续萧条表现为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 赤字财政危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使经济迅速走出萧条,日本政府积极扩大公共投资,出台许多紧急经济对策。如1993年为处理泡沫经济后遗症,政府投入资金10.7万亿日元,1994~1995年增加公共投资近30万亿日元,1998年增加公共投资24万亿日元,为金融紧急对策投入60万亿日元,1999~2000年度继续扩大财政规模。到2000年底,日本政府债务高达650万亿日元,2000年的财政赤字占当年GDP的11%[4] (P29)。市场的狭小和经济萧条加剧了财政危机,而财政危机又会加重经济萧条。

时间证明,依靠日本国内狭小市场以及现有亚洲经济合作模式很难走出经济困境。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在2010年建成,它将创造一个19亿消费者、3万亿美元GDP、1.2万亿美元贸易总额的经济区,如果日本政府能够快速调整经济安全战略,首先加快与东亚国家实质性合作,作为亚洲经济大国的日本便可以在短期内恢复国内经济快速增长。

第二 金融风险危机。日本金融机构是20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的始作俑者,同时也是泡沫经济的最大受害者。据统计日本已经处理银行不良债权68万亿日元,约合5600亿美元,但处理旧的不良债权,又出现新的呆账,截止到2001年6月底,日本还有32万亿日元的不良债权[2]。不良债权问题的久拖未决带来金融市场的萧条,经济主体资本的缩水降低其适应环境的能力,特别是作为贷款方的金融机构在自有资本不足情况下,采取严格规避风险的惜贷行为,严重影响企业的投资。不良债权加重经济萧条,而经济萧条又增加了金融机构不良债权的清偿,这种恶性循环使日本经济的恢复积重难返。

美国投资基金以趁火打劫的方式,“帮助日本银行”清理不良债权。他们以账面价格的1:10购买不良债权,经过1—2年法律或经营上的运作,转手就可以获得10%以上的高额利润。如果日本能加强与亚洲国家货币合作,建立和完善亚洲货币基金和货币互换制度,提高亚洲各国有限资金的流动性,则可以强化区域内自救与自主机制免受更大的经济损失。

第三 科技战略危机。日本在实现跨越式发展过程中,跟随式发展战略为日本经济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日本经济追赶是通过当时国际市场成熟的机电技术改造获得,并作为国家支柱产业大力扶植和发展,而这些行业随着日本对亚洲直接投资的增加,亚洲国家产品以其低廉的价格与优质的性能和质量,迅速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致使日本国内竞争优势被不断削弱。高新技术领域,美国优势显而易见,几乎垄断电脑软件市场,占有70%的份额。在信息高速公路上也占

有绝对优势,迫使日本国际技术竞争优势丧失。曾经是日本后发国追赶先进国的经验,却成为高新技术发展的瓶颈。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国际竞争力集中体现在科技的创新与开发上,它是企业提高竞争力、争夺市场、获取高额利润的重要手段。要保持竞争优势需要通过建立国外研究机构,与外国组成战略联盟,才能及时弥补自身战略缺陷和规避风险。

历史告诉我们,日本经济是冷战特殊历史条件下孕育的一种畸形经济,冷战给日本带来巨大的好处。欧美出于“以日制华”战略考虑给予日本最大的经济和技术扶持与援助,但是,日本的突然强大,并无法改变下列事实:国土狭窄、市场狭小、资源匮乏、人口数量有限又呈负增长且老龄化趋势严重、内需严重不足、严重依靠以美国为主的外部市场,国内市场对外封闭保守,排外情绪严重、自负与自私兼举,生产与消费脱节等等。这些痼疾大多是在冷战条件下形成的结构性弊端,且长期被冷战特殊气氛所掩盖。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习惯于在冷战式经济结构中发展的日本经济对新经济环境越来越不适应。日本政府必须调整冷战思维,才能在新的国际局势下使日本经济安全获得保证。

三

面对经济全球化时代,日本经济再次获得发展的契机——真诚与亚洲各国合作获得更广泛的国际发展空间,这对于原料市场和销售市场两头在外的日本经济安全至关重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日本政府采取不合作态度,其结果造成日本经济的雪上加霜。日本政府应该正确认识历史,主动拆除“围墙”,消除邻居的顾虑和担心,与亚洲各国建立互补、互促、共赢的合作关系才是现代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明智选择。

首先,拓展与亚洲国家人员信息等资源的全面交流。由于日本把亚洲仅作为销售市场对待,重点放在资金和商品领域的流通,而对人员和信息合作与交流相对不足。事实上人员、物资、资金和信息作为重要经济资源,它可以代替它国非流动性资源实现“间接”流动以弥补日本的资源不足。因此,调整和修补与亚洲邻国的关系,增进相互间理解和信任基础上的全面合作,最大限度地发挥地区内资源的整合优势,对处于老龄化社会的日本来说将受益匪浅。

日本国内经济的长期萧条,已经削弱了日本反击美国打压的能力,日本唯一可依靠的只有结成亚洲战略伙伴关系。根据 BvD 全球金融、宏观经济指标库数据分析,东盟 10+3 模式拥有人口 21 亿人口,GNP 为 7 万亿美元,完全有能力与美元区、欧元区相抗衡。如果 13 国以自由贸易区为目标,加深相互合作,将大大提高亚洲在国际机构的实力和发言权,彻底改变日本在日美安全体系中的从属地位。

其次,加强与亚洲国家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协调与

合作。2005 年仅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储备加起来 2 万亿美元的规模,约占全球外汇储备的一半。如果汇集这些资金建立区域性援助机构,能够迅速有效地对遭受危机的国家提供紧急贷款。另外,亚洲国家和地区经济管理体制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更容易了解彼此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也更容易对症下药,正确提出适合遭受危机国家国情的改革方案。

日本政府已对日元国际化采取一些积极的姿态和行动,2000 年 2 月 2 日根据“新宫泽构想”,日本为印尼、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提供了 210 亿美元资金,其中 135 亿美元为中长期贷款。“新宫泽构想”还为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国家提供了 22.6 亿美元的贷款担保。相信亚洲货币合作在各国政府的积极支持和推动下,一定会克服重重困难在近年内取得成效。

最后,积极向亚洲发展中国家实施有效技术转移战略。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大大缩短了科技产品的使用周期,单纯依靠本国技术创新很难在各个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由于比较优势的存在,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离不开以技术转移方式谋求经济发展,它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基本法则,西方发达国家为抢占市场纷纷加快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但是,日本政府却始终在技术转让方面对亚洲国家采取保守性政策,随着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全面崛起,高科技产品市场的制造和技术研发能力不断提高,已经迫使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展开技术性竞争。德国在上海磁悬浮列车项目上积极向中方转移核心技术所带来的利益,已经说明日本以本土市场为中心的梯次产品转移战略在中国市场失败,已经警示日本在亚洲领头雁位置受到了挑战与威胁。

总之,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严重阻碍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迫使世界大多数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把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区域经济合作的框架范围。如果日本政府能够明确和调整经济安全战略,扩大自己与亚洲各国的交往范围与合作深度,一个团结合作的亚洲完全可以创造新的发展奇迹,同时,也是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基本保证。

参 考 文 献

- [1] 汤菲. 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 天津商学院学报, 2002 (4).
- [2] 裴桂芬. 东亚的真诚合作: 日本的唯一选择[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2 (9).
- [3] 陈建, 王卓. 中日经济关系: 以合作出共赢[J]. 教学与研究, 2005 (9).
- [4] 日本经济产业省. 通商白皮书[Z]. 大藏省印刷局出版, 2001 (6).

(责任编辑 朱春玉)